

[文章编号]1009-3729(2012)03-0003-0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 儒学复兴的可能与路径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也使儒学复兴成为可能。传统儒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末学的式微状态,儒学复兴也因其缺乏创新转化共识和生活场域基础及偏重心性世界而困难重重。注重生活实践、道德培养与伦理教化的公民儒学的发展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可能,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精神塑造将是儒学复兴的未来走势。在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上,儒学应以义理革命为基础,立足内容创新、时代需要与文明发展,着眼于返本开新、文化交流与人文关怀,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精神变量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合一”的内源因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合一”的进程中获得新生与发展。

[关键词]儒学复兴;公民儒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中国传统儒学发展面临深层危机因而试图实现创造性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在今天不期而遇。一方面,在二者实现内在对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它辩证地吸取并融合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髓,对之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的方向,使传统儒学在自我拓展、自我生成中获得了一次文化复兴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荡涤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旧灰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则使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生长成为可能,使传统中极具价值的思想学说通过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而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并在科学改造中实现现代转型。

事实上,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儒学复兴的争论从未间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西化派、现代新儒家等在内的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从政治儒学的困境、儒学创生的条件、儒学返本开新的可能等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鉴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本文拟以此为背景,从儒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缺乏生活场域基础——切入,分析儒学复兴之可能及未来走势,探讨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一、儒学复兴的困境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儒学在近代百年沿革中,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了末学的式微状态。在此尴尬境遇中,欲使儒学再度复兴,谈何容易。对此,有人从儒学自身找原因,认为:一是面临多元思想撞击的反复挤压和多重解构,在边缘化、碎片化、

[收稿日期]2011-12-03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中心资助课题(H2012-1)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尉氏县人,河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隐匿化的衰变中,儒学的农耕基础和宗法基础已然崩裂,其文化原典与叙事结构遭到颠覆,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论坛上处于失语状态;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强大压力下,传统儒学的知识体系全面崩溃、屏障全失,其主导性价值原则几近气丧命绝,或作为断裂的文化碎片散落在人文学科的边缘,或作为失去活性的精神因子沉寂于史学研究领域的隐层;三是在场域收缩和思想游弋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儒学的生命活力已然丧失殆尽,它早已变成漂浮的观念、思想的碎片和文化的点缀;四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市场化、商品化、工业化、都市化浪潮的狂飙,使得儒学的生活基础日益贫瘠,其身份因无所依归而趋于模糊,只得遁入书斋,自我放逐。^[1]也有人从儒学之外找原因,认为:本来,儒学创造了对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而深刻的独特理解模式,塑造了复杂而微妙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然而,现代中国学人在对传统儒学进行理性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和怎样表述它,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思想框架和平台来进行诠释,力图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2]结果就造成了当代儒学的尴尬处境。

关于儒学复兴何以可能的研究,当前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派别,还是坚持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论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正统主张,还是强调中国文化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激进探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现代西方的理论范式并引以为圭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已习惯于用西方的现代性镜子来鉴照自己。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当代中国学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这种集体性精神误认严重损害了中国儒学的思想意义和理论力度,破坏了它本来的文化性能和学理价值,它的观念和问题也被荒诞化、泡沫化、边缘化,中国儒学原本和谐的概念系统被支解,那些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儒学范畴,如仁、道、天、理等,一经西学阐释便变得意义轻薄、空洞无物甚至相互冲突。

显而易见,一方面,西学观念的大量涌入唤起了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压缩了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领域,使中学丧失了自我规定性而显得不伦不类;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只有通过中西融通才能摆脱这一理论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文化传统是这个世界上同样高度发达而范式又相差甚远的思想体系,而且各自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发

展又完全不同,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可以实现二者的会通。要实现不同思想体系之间观念的会通,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通过机械性拼接和简单性比附等各种伪创新的举措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搭建什么“真诚的对话平台”来完成。对话或交流的确可以促进彼此一定程度的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只能产生有距离的承认。异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显然还需要一种基于共同生活需求而产生的共识。

但吊诡的是,建立双方共识并形成互惠交往的困难恰恰在于,以什么生活场域为基础、通过什么样的问答逻辑而产生怎样的视界融合,是“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是“援儒入马”抑或“以西非马”?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儒学的思想内涵层面分析,认为儒学的心性之学对入学意义的追寻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提升,它以心性之学与“内圣”追求的交融为内涵,将人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与存在价值的体认提升到了引人瞩目的地位,空前地突出了人性的精神自觉,内在地体现了人性化存在的当代意向;但从心性本体的视域出发去考察人之存在的意义世界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却同时使之陷入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的困境中,而未能充分关注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及人性的多面性。^[3]因而,心性儒学只注重意义世界内在形态或观念形态的建构,而忽视对其现实语境、外在形态的基础建设。这既泯灭了人学之意义世界本身的当代性,也使其意义追寻呈现出抽象性特征,往往以抽象心性之维的虚假存在消解了对象世界的客观实际。所以,儒学因隔绝于现实认知和实践过程,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而沦为封闭、玄虚的精神自慰,如此要实现其“当代复兴”,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

二、儒学复兴的可能及其未来走势

其实,传统儒学是由历史传承下来、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质的思想纽带,它渗透于广大民众的思想道德、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语言文字中,具有极为宽泛的理性内涵与文化底蕴,深刻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学界一般将儒学划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制度层面(即政治儒学)、日常生活层面(即公民儒学)、精神信仰层面(即信仰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它的制度规训功能及其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儒学,它的当代建构也难以实现。

看来,复兴儒学的最好路径就是从公民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和公共伦理层面的教化作用。若从儒学的延续性、超越性、大众性、时代性等方面分析,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能够包容过去、启示现在并开拓未来,在价值选择与文化认同方面铸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凸显我们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确存在着复兴的契机,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然而,在它的社会基础严重崩塌、文化观念彻底断层,受到异质多元思想猛烈冲击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态势的强力推进中,传统儒学的当代复兴的确面临着诸多困境。

事实上,儒学复兴之所以在现代遭遇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必需的宗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缺乏公民儒学之生活基础,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冷漠和疏离。因此,儒学在现代要发挥教化作用、实现意义创生,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观念,成为民众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此,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生活化的途径向普世化、时代化的公民儒学转化。如此,就不能如传统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从内在超越的心性层面发掘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大众世俗价值的贵族化倾向,重新激活并发扬传统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意蕴,尊重普通大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理解并自觉顺应人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生活实践,将儒学彻底大众化、时代化、生活化,由羞于口、弊于言的“内丹学”转化为与现代生活需求和情感认同合拍的“外丹学”,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和真信念。时至今日,重新确立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已决无可能,而从生活场域来重构其思想进而实现平民儒学的复兴倒是可能的。

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彻底变革和家庭伦理的根本转型。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根性,被市场化的各种物欲裹挟的现代人真的容易挣脱现代生活的藩篱而主动趋向传统儒学的心灵救赎吗?恐怕未必。连重建日常生活基础尤其是重构家庭伦理生活场域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公民儒学的真正复兴了。传统儒学作为封建社会中农耕文明、宗法制度下的血缘文化和以心性修养为主的“内圣”之学,它的影响与作用向来具有两面性,它既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公共心理和共同人格,又造就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和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自贱品格,其消极影响一旦

通过平民儒学而死灰复燃,就会毒化人们的心灵、污染社会环境,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构建。可见,儒学既积淀着精华又充满着糟粕,其复兴之路既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而使民众普遍接纳,也不能执行“全盘西化”而使其彻底颠覆,只能采取视域融通和实践整合的创新之路,通过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改造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简单拼凑抑或单纯移植,既无法充分汲取和创新利用儒学的丰富资源,也不利于新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新塑造。

三、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要真正实现儒学的复兴,传统儒学还必须进行一次真正的义理革命,以摆脱传统儒学固守抽象研思的旧理路,而与当代思想集体开展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其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能否为人类的文化创新开出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原理,为我们提供当代中国文化所凝聚的多元智慧与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才是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

时下,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因而需要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重新走向新生。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于21世纪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获得新的发展、实现复兴是很有可能的,但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从内容看,儒学复兴必须是能为当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支撑的生生之学,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和合之学,是返本开新、奋力开拓、与时俱进的创新之学。从时代需要看,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儒学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弘扬中华文化、融汇古今中西,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努力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境界。从文明发展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分不和谐的状态之中,有许多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共同难题,诸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由于过分注重物欲与感官享受而导致的身心失调、人格分裂与身份迷失等。^[4]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只有在对人类宇宙根源与人性

道德根源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切身体悟中,才能洞察人文危机、存在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形成新的天人合一观并以此培植出新的国民意识。^[5]这些都表明,儒学作为一种曾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而终结^[6],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代替,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后,则有可能作为内在精神变量而再度复兴,并成为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变量之一,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形态。^[7]复兴后的新儒学即“后现代儒学”,将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提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精神塑造作用。

当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大潮中,儒学复兴不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方向,只有实现当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儒学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要解决与儒学复兴相关的任何现实问题,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框架而抽象地、教条地对待儒学复兴,必须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学的糟粕,探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中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

的途径和模式,提炼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生相融关系,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儒学的民族特性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实现整合的可能道路,发掘出其中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实施。^[8]

[参 考 文 献]

- [1] 景海峰. 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J]. 学术研究, 2008(3): 46.
- [2] 赵汀阳. 哲学的中国表述[C]//论证(2).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82-92.
- [3] 杨国荣.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J]. 河北学刊, 2008(1): 35.
- [4] 朱荣英. 物化的时代与哲学的使命[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1): 54.
- [5] 成中英. 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2): 39.
- [6] 汤一介. 论儒学的复兴[N]. 人民政协报, 2009-10-12(4).
- [7] 许全兴.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2): 4.
- [8] 郭齐勇.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6): 56.